

澤 畔 悲 吟

屈原：历史峡谷中的永恒回响

刘毓庆

龍門叢書



刘毓

屈原：历史峡谷中的永恒回响

[晋]新登字3号

责任编辑 李 健

封面设计 金 星

泽 畔 悲 吟

——屈原：历史峡谷中的永恒回响

刘毓庆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11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闻喜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字数：99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

ISBN 7—5440—0183—0

G·184 定价：3.40元

总序

沿着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双轨，我们启动机车，向龙门进发。

黄河东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龙门，神州之形胜；

龙门，中国文化之门；

龙门，开凿混沌的象征；

龙门，开放、发展的印证！

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辉煌而又沉重，它的精魂在文学的形象中载沉载浮。传统文学不是苍白的幽灵，而是鲜活的生命，它在与现代人的交流、对话中获得永生。

作为民族感情的升华，作为民族精神的闪光，作为民族灵魂的运作，作为现实的文化背景，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据，我们试图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底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以丛书的形式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时代呼声作出一种回应。如果根据周易的原理，将文学分为艺术及思想内容层，个性心理意识层，群体心理意识层，民族及人性心理意识层等四个不同层次，那么我们现在更着意于探索其深层的“动静”，沟通历史与现实，通过对昨天的反思，认识今天的形象。审美说到底是一种生命存在和体验的方式，对民族审美体验的结晶物——文学的重新品味也就是民族生命的认同和更新。

龙门是神秘的，龙门是幽邃的，龙门是開啟的，我们将深入，再走出，然后跳过！

我们曾经都是鱼，我们将成龙，还将在见首不见尾的腾挪变幻中向无际的天宇作永恒的追寻。

“龙门”丛书编委会

引子

初夏啊和暖，
草木啊纷繁；
我的心却久久哀伤，
象急流啊奔向江南。
四顾啊茫茫，
大地啊寂然；
我的心绞痛似割，
长留着伤痕斑斑^①。

一个孤独的身影在泽畔江风中徘徊着，悲吟着。枯瘦的身躯已无法承受心灵的重荷，憔悴的脸上却仍带着几份傲然的神情。对这个世界他不屑一顾，因为感到这里只有欺诈、丑恶、痛苦和无奈。他不愿对醉生梦死的人们再说什么，因为这已没有意义；也不愿再与世界发生摩擦，因为这只能自取其辱。茫茫天地间，唯余一片死寂。他知道，面对昏暗、死寂与绝望的痛苦，死亡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他又不愿将圣洁之躯留在龌龊的世界，故在公元前3世纪一个盛夏的黄昏，纵身跃进了茫茫汨罗……

这就是屈原！一个伟大的名字。他是弱者，在振世无力的绝望中走向了死亡；又是胜利者，以死而震撼了历史，赢得了

① 用董楚平先生《楚辞译注·怀沙》译文。

亿万颗心的崇敬。他是诗人，他的生，他的死，都是绝佳的“悲情诗”；又是巨人，他的悲歌，他的叹泣，声满天地，成为回荡在历史峡谷中的永恒的声音。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文化巨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就是屈原。孔子统治了民族的思想意识，却不得不把情感、精神的领域让给屈原。对孔子，人们只是理智地接受他的说教，而屈原却能唤起人们内在生命的冲动，给人以奔放、飞跃、自由、冲决的力量。这就是他存在的永恒的意义。

尽管有人否定屈原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却无法将这个名字从民族心灵中抹掉，因为他在民族文化史上已留下了深深的纪念。你可以不承认他的存在，却不能不承认《楚辞》与屈原传说的存在。即便这一切都是伪造，你也无法否认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屈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他的本事就是民族心灵一曲深沉、悲哀、思虑、忧伤的歌。透过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掩盖在繁杂的历史表现下的一个广阔的精神文化层次。这种文化现象的不断延续和衍化，也在呼唤着我们对此作出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目 录

引 子

一、“文化生命”之根的探寻	(1)
1. 历史：传自远古的信息	(2)
2. 时代：燃烧的精神	(10)
3. 楚人：苦闷的心灵	(19)
4. 贵族：被系的生命	(29)
二、徘徊于历史的幽灵	(39)
1. 文与政：中国文人的生命基型	(40)
2. 惑与谗：专制文化的永恒雄霸	(49)
3. 恋与怨：生命意识的双向运动	(57)
三、澎湃的情感世界	(66)
1. 《离骚》：尖掘生命的呼嚎	(67)
2. 《天问》：困惑与超越	(76)
3. 《九歌》：渴望与幻灭	(86)
4. 《九章》：走向死亡	(95)
5. 生与死：人生价值的双重选择	(106)

四、历史的回响	(115)
1. 屈原文化效应.....	(115)
2. 屈原效应之分析.....	(122)
3. 人格之升华与效应之加大.....	(134)

一、“文化生命”之根的探寻

当一个婴儿呱然堕地的时候，有谁想到他富有个性的形态里，已获得了祖祖辈辈的遗传呢？生命的生产就是这样，一代代遗传，一代代变异。太极生成理论告诉我们^①，任何个体生命之中，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命遗传要素。一个三代白痴的家庭，不可能产生爱因斯坦；一个伟大的生命，只能属于有着优秀遗传的血统。而“屈原”——一个影响历史的文化生命，“他”的遗传又来之何方呢？

当我们面对这一“文化现象”发问的时候，它突然象套色

① 《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谓“太极”是指阴阳未分时的混沌态，是万物之本。虽非阴非阳，而阴阳却全包括在内了。“两仪”、“四象”是事物由混沌到具象的过渡层次。八卦则是近于表层的东西。这是事物生成、进化的过程，也是生命获得遗传基因的过程。在表层的具体物或个体生命中，蕴含了叠压的几个层次的诸多因素。也就是说太极、两仪、四象三个层次，决定了八卦层中具体物的表现形态。如八卦中巽下叠压的是四象层中之少阳、两仪层中之阴与太极层，而巽卦符号三中，既蕴含了少阳“—”和阴“--”，也蕴含了未分化的太极。八卦——具体物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事物的吉凶。此理论说明：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深层的原因。越深层的东西涵盖面越广，越表层越具体。

板一样，带着各自的色彩，一层层分裂了。历史的、时代的、地方的、集团的，逐层跳进了我们的思维圈。

1. 历史：传自远古的信息

历史文化是持续的生命。它属于过去，也决定着未来。在《楚辞》与屈原的身上，既携带着历史文化的信息，也昭示着一个深远的民族文化的根柢。为明此理，此章中我们不妨来一个小小的考证。

屈原《离骚》开卷第一句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注释家们都说：高阳就是颛顼。其实这是一场误会。高阳和颛顼实为二人，清代学者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就已对此产生了怀疑。因为在《左传》的一段话中，先提到“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又说：“颛顼氏有不才子”；在《楚辞·远游》中，先说“高阳邈以远兮”，又说：“从颛顼乎增冰”。高阳、颛顼分举，其非一人甚明（参见董楚平《楚辞译注》附《〈离骚〉首八句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按：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牛贵琥《高阳、庚寅新释》、笔者《高阳苗裔新说》，对此皆有考证）。可是不知何时，二人的传说却合并为一了。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不小的糊涂账。不过，这笔账糊涂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恰恰暗示了楚文化的两个来源。王逸说屈原是颛顼的后裔，《楚世家》说颛顼是楚之先祖，我们相信这是有根据的。追溯到远古洪荒的时代，颛顼虽具有上帝的神格，而其实体实是一个以龟为图腾的氏族。《说文》说：颛，头颛颛谨

貌。项，头项项谨貌。颛顼、顼顼都是小谨之意。也就是说，颛顼的本意是形容脑袋谨小之貌的。《河图握短记》说：“黑帝（颛顼）修颈”，又说：颛顼“并干、通肩、戴干”。《春秋元命苞》也说：“颛顼并干。”《潜夫论·五帝德》、《白虎通·圣人》、《论衡·讲瑞》等都有同说。脑袋谨小、脖子修长，肋骨相连，这描写的正是乌龟的形象。《山海经》说：“颛顼死即复苏”，而乌龟也正有此“死而复苏”的本领的。在古宗教神话中，颛顼为北方大帝，如《淮南子·天文训》说：“北方水也，其帝颛顼”。《河图》则说：“北方黑帝，其体玄武”。而王逸《九怀》注说：“玄武，大龟，水神。”《礼记·曲礼》疏也说：“玄武，龟也。”由此可见颛顼与龟图腾的密切关系了。

在上古时代，中国本土的氏族图腾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在西者为爬行类图腾阵营，在东者为飞鸟类图腾阵营。飞鸟类图腾氏族最高崇拜物是太阳，故可名之曰太阳文化系统。爬行类图腾氏族，则把月亮认做最高崇拜物，故名之曰太阴文化系统（参见拙作《阴阳二元文化与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形成》人文杂志 1990.2）。颛顼显然是属于太阴文化系统的。如《淮南子·地形训》云：“蛤蟹珠龟，与月盛衰。”颛顼的后裔有夏人，而《遁甲开山图荣氏解》说：“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生夏禹。”这些地方都透露了颛顼氏族崇拜月亮的信息。据古籍说，颛顼氏的活动多在西方或北方，颛顼其葬、其墟、其族、其神都在北方，即夏人的文化区域内。看来夏人才是颛顼氏文化的主要继承者。楚夏同出之颛顼，文化上自然有较多的联系。故在楚辞文化中有许多与夏文化相同的太阴文化因子。

屈原又自称是高阳的苗裔。这一层关系自然更可靠了。可

是古籍中保存的关于高阳的传说太少了，而且又与颛顼的史料相混杂，这就造成了许多麻烦。可喜的是中国文字的特殊构成，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线索。由音求之，高阳当即“高唐神女”之高唐，唐、阳古音相通，如成汤之汤，卜辞、金铭中即写作唐，《说文》说：“暭或作汤，通作阳。高唐神就是楚人的高禖神，亦即始祖神（用闻一多说）。由形求之，阳甲骨文作早，上为日，下为祭祀所用的搁物架，即“示”，表示着对太阳的崇拜。由义求之，阳者日也，高阳当即日神，与太皞炎帝同一神格。由传说求之，高阳又有点象上帝神帝俊。帝俊有子八人，始为歌舞；高阳也有才子八人，名曰八恺。恺意即欢乐，与歌舞意相关。帝俊有子曰中容，高阳亦有子名仲容。由此看来，高阳具有祖先神、日神与上帝神三重人格了。牛贵琥认为高阳即日神炎帝，确是合情合理。

以高阳或高唐命名的地名，古籍中载之甚多，而大多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北等地。这一带也有以阳丘、阳陵命名者。这里封存了高阳氏族早期活动的信息。而这一地区正是远古的太阳文化区。最有代表性的是商族，他们不仅对日举行祭祀的常典，而且还自认为是日神的子孙，以日名作为自己的名字。高阳氏当是太阳文化中的一支，或许与商人有此瓜葛。据《华阳国志》说：高阳就是帝喾。此说虽未必可靠，却也暗示了高阳与商人的关系。因为帝喾就是商人的始祖，据近人考证，就是甲骨文中的高祖夔。

楚人还传说他们的老祖宗有个叫祝融的人。《海内经》又说祝融是日神炎帝的后代。如果高阳确是炎帝，那么这层关系就理顺了。《吕氏春秋·孟夏纪》说：“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天文训》又说：“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朱明、祝

融乃一声之转。他们都是商祖昭明神话的衍化。

一、昭明即光明之意，而《郑语》说：“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煦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是祝融、昭明其义相同。

二、昭明即陶唐氏之火正阏伯（据《荀子·成相》、《殷本纪》说，昭明迁于商，卒后其子相上立。而《左传·襄公九年》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属于商丘，相上因之。可知其为一人）。而祝融则是高辛氏的火正。是二人神格相同。

三、据《左传·昭公元年》说：上帝惩罚阏伯（昭明），把他迁到了商丘。而《楚世家》说：帝于庚寅日诛祝融。《周语》也说：祝融被惩罚流放到了崇山。是祝融、昭明遭遇相同。

四、昭明为商人之祖，祝融为楚人之祖，是二人人格相同。由此更可以看出楚与商的关系了。

因为楚文化植根于太阴文化与太阳文化两种历史文化基础之上，因而它有深厚、广阔的内涵。它的原始底色乃属于太阴文化系统的，特别于太阴文化中同源于颛顼氏的夏文化，有诸多相似。如夏人崇拜龙，楚人亦崇拜龙。古籍言鯀化为黄龙，禹为勾龙，禹治水有神龙相助，禹所凿山叫龙门，夏启乘两龙等。而《楚辞》中则有驾飞龙、麾蛟龙、驾八龙、驾龙辀、驾两龙、驷玉虬（即虬龙）、骖白螭（无角龙）之说。夏人崇拜数字“九”，在夏人的传说中，有九畴、九州、九道、九泽、九招、九牧、九鼎、九川、九薮、九原、九隩、九代、九辩、九歌等。楚人也崇拜九，如《楚辞》中有九畹、九死、九坑、九天、九河、九子、九则、九重、九首、九衢、九逝、九关、九约等。并有篇名《九辩》、《九歌》，则屈原自己说，此二曲乃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夏人所得，楚人所歌，其间关系，不言自喻。楚人中亦多夏人传说，且有许多不见于

儒家经典。顾颉刚先生曾根据《楚辞》中关于鲧禹的神话，得出禹为南方民族传说人物的结论。虽未必为确论，却也值得深思。楚人所用也是夏人的历法，而非周历、殷历。

更值得注意的是，楚地还存有夏文化遗迹。近十几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据专家们研究，这是一个不同于黄河流域的、有自身连续发展序列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西至长江三峡，东至鄂东，北至伏牛山麓，南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文化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三段即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期。主要遗存有下王岗晚期、青龙泉二期，李家湖下层，易家山等。从下王岗晚二期文化层起，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系统，忽然发生了极大的动荡，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并在淅川下王岗和黄陂盘龙城发现了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遗物。而这一地区的原有文化序列，在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晚期）以后猛然中断。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俞伟超先生认为，这是夏禹南征三苗，将北方文化带到了南方（见《文物》1980.10）。其实与其说是大禹将北方文化南传，毋宁说是楚人南迁将北方文化移植到了南方。因为夏人南征，并没有长期统治那里，不可能使那里的文化性质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以至中断。只有北方部落长期南居才有可能。就如同欧洲人移居美洲，使美洲大陆发生巨变一样。现代学者多主张楚人为北人南迁者，此说甚是。黄河流域存有数处楚丘地名，如《春秋隐公七年经》“戎伐凡伯于楚丘”（在山东曹县），《春秋僖公二年经》：“城楚丘”（在河南滑县），卜辞有“箒于楚”等，此当为楚人之故地。与原始文化不同，楚人的政治文化，却带有浓郁的太阳文化的特色，与商文化极其相似。如商代官吏之长称尹，文

献、卜辞中俱有实证。如所谓伊尹、庶尹、衡尹、黄尹、右尹、梦尹、多尹等。西周也偶有称尹者，而楚国则有令尹、县尹、左尹、右尹、工尹、连尹、莠尹、玉尹、卜尹、清尹等。显然是商之遗矩。商称先王为后，如占后、先后、神后、高后，卜辞中则有后祖某、多后等。周人则多称先王为王，很少称后。楚人则沿商人的习称，《楚辞》中如“昔三后之纯粹”、“后辛之菹醢”、“肩代益作后”等。称“前王”者仅一见。商王常传位于少子，而《左传·文公元年》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商人好淫祀，故称岁为“祀”。其对山川日月，风云雷雨，无所不祭。祭祀中有时商王还亲自把羽而舞。故甲骨中常见有“王舞”、“王舍舞”之类的卜辞。《礼记·表记》曾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与商相同，楚人似乎也是“率民以事神”的。《汉书·地理志》曾言楚人重淫祀。桓谭《新论》亦说：“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事上帝，礼群神。躬执羽幢，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礼神明，当蒙福祐焉，不敢赴救”。其狂热程度，如果没有一种潜在的文化因素，单凭其个人的喜好，恐怕是很难达到的。

太阴文化与太阳文化交媾，在南方文化的土地上，生出了楚文化这一巨大产儿。但这两种文化基因，在楚文化中并非不分主次地存在着的。如果以夏为太阴文化代表，以商为太阳文化代表，在《楚辞》中便可明显地看出主次来。夏先于商而存在，可是《楚辞》却先商而后夏。如《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怀沙》：“汤禹久远兮”等。将商汤及汤之贤臣挚置于夏禹及夏臣之前，反映了太阳文化

比太阴文化更为深刻的影响。再如夏人之曲《九歌》，在楚国所演唱的内容，几乎大半是商人的。所谓东皇太一，实际上就是商开国之君成汤太乙；所谓东君，即甲骨文中所祭的东母；所谓云中君，即甲骨文中的帝云；所谓司命，即甲骨文中的“命”；所谓河伯，即甲骨文中所祭的“河”；所谓山鬼（当为魅之残字），即甲骨文所祭的五山、十山之神（参见拙文《九歌与殷商祭典》。《山西大学学报》1985.2）。而且楚祭东君、东皇，而不祭西君、西皇，自然也有深刻的涵义。更有趣的是关于楚人先祖祝融的传说，《山海经》说他是“兽身人面，乘两龙”的怪物，而《白虎通》却说“其精为鸟”，《古琴疏》又说祝融作琴，能致五色鸟舞于庭中。由兽到鸟的变化，正反映了太阴、太阳两种文化在南方接触而飞鸟图腾的太阳文化居于上风的历史过程。

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当与楚王世血统的变化有关。楚之先本是太阳文化中的一支，即颛顼之后三苗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肇姓”。肇通黎，即“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之黎）。由于太阴文化内部的分裂斗争，三苗被战败，窜入南蛮。在那里与当地土著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楚部落联盟。并使太阳文化在那里生了根。但楚人并未忘“光复”，故夏商之时，不时与中原集团发生冲突。成汤时曾南伐过荆楚。殷王武丁为了彻底征服这南蛮故国，大举南征，深入其地，俘虏了许多奴隶，并在楚地进行了政治革命，彻底统治了楚国。《商颂》详记其事云：

挞彼殷武，奄伐荆楚。入其墮，哀荆之旅。有
截其所，汤孙之绪。

所谓“截”就是治，意即“汤孙”成了那里的统治者。据此则知武丁曾封商贵族于楚，犹如周成王封弟于唐一样。因而使楚